

背水一战

·从香港纱厂小工到香港科大副校长的心路

孔宪锋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



海外山东名人传记丛

背水一战

——从香港纱厂小工到香港科大副校长的心路

孔宪铎著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**背水一战：从香港纱厂小工到香港科大副校长的心路／
孔宪铎著．－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1999.11**

ISBN 7-80642-273-0

I . 背… II . 孔… III . 孔宪铎 - 传记 IV 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3652 号

海外山东名人传记丛书

背水一战

——从香港纱厂小工到香港科大副校长的心路

孔宪铎 著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：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：250001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52×228 毫米特 16 开本 10.25 印张 300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—80642—273—0

I·59 定价：24.00 元

目录

1 —————

第一篇

背水一战

145 —————

第二篇

香港经验

247 —————

第三篇

农业与教育评论

297 —————

后记

303 —————

附录

第一篇



一·本书开场白

2

1995年年底，我将《六十自述》完稿，请台湾《远见》杂志的王力行总编辑过目，她推荐给《传记文学》，今年（1996年）1月《传记文学》以《从纱厂小工到大学副校长》为题作特稿刊出，我分赠亲友，获得很多意外的鼓励。香港《新闻天地》卜少夫社长说：“……乃一奇迹，……可以鼓励若干青年……。”同事丁学良博士和内人傅静珍女士都要我多加一点“血”和“肉”，以凸显内心的真情实感，并有助于提高可读性，同时，也要反映当时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动荡。所以我将1.5万字的原文扩充到3.5万字，增加了很多以前忽略的往事和生活的细节，也添补了许多反映的时事的情景和遭受动乱的痛苦。我订标题为“从香港纱厂小工到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心路”。用“心路”而不用“道路”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，因为在我奋斗的过程中，面前没有道路，路只在心里。

可是在第二次完稿之后，又觉得似未叙完，意犹未尽，除了再增添许多往事与细节之外，正好趁今年暑假回马里兰与家团聚之便，翻箱倒柜地找了一些相关资料，增加了很多篇幅。重新调节了内容，进一步地把这5年来在香港对各项事物观感，作了分析与叙述，字数由3.5万增加到现在的15万字。

从整体来看，我对学问的追求和事业的建立都靠着一股力量。这股力量，不是别的，就是“背水一战”；从香港到台湾读大学，靠的是“背水一战”；从台湾去加拿大深造，靠的是“背水一战”；加拿大到美国任教，

靠的也是“背水一战”；即使从美国回到香港创校，靠的还是“背水一战”。很自然地，“背水一战”就成了这本书的主旨，从而订为书名。可是再从另一方面看，假使我把人生当做赛跑的话，这赛跑的起点在香港。再从整个内容来看，几乎有一半所记的事物是与香港有关的。如果没有香港的环境或不在香港这块土地上，我所述的事情大半都不会发生。所以我最后决定在“背水一战”大标题之下，用“从香港纱厂小工到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”作副标题，以便读者容易了解内容。

我的经历虽然非常艰苦，但每当与孩子们谈到的时候，他们总是提不起兴趣，因为他们都是生长在一个安乐的时代的一个安乐的家庭。所以我就不太热衷于写成文字，加上业务繁忙，人事烦恼，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提笔。还是在1994年春天，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要出一本名人录之类的书，向我索取资料，我请秘书李咏梅小姐根据台湾《远见》杂志、香港《君子》杂志、郯城《古今名人名文集萃》和中外各报章的访问记，摘录近两千字的稿子。我趁1994年暑期回美国马里兰度假之便，依照李小姐准备的稿子，加上内人的润色，完成一篇四五千字的传记性资料，递交山东侨办。

1995年春，60岁生日过后，我就起了一个写“六十自述”的念头。那时家兄宪佐正好来港相聚三个月，我向他提起，他很鼓励，于是我就以这四五千字的资料为起点，经过半年来许多次的增删、修改和润色，也经过许多朋友的阅读和建议。尤其是向我办公室内几位年轻朋友的咨询。最有启发，处处表现了不同时代人的想法和看法，我都一一接受了。

在我撰写这篇自述的初期，手头上并没有什么资料，有的也是以后找到的。起初一切全凭记忆，可是写的越久，勾出的往事越多，写的越细，引发的情节越深。所以这自述，好像是山东的高庄馒头，是一层一层的揭开来的，又好像是中国的蚕丝，是一丝一丝抽出来的。从初稿的5000字，到刊登在《传记文学》的1.5万字，到扩充的3.5万字，再到现在完稿的15万字是最好的说明。

总括来说，我写这本书的主旨有三，一是描述一个真实的人生，从童年、青年、中年到老年奋斗的过程；二是描述从一个小国民一生中所经过的动荡时代，由中日战争、国共内战到海峡两岸三地；三是让现代生活在温室里的人们嗅到在那一时代，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挣扎的血汗味。不论如何，希望对过去的回忆，力求真实，不加掩饰，以真面目问世。更希望对事物的叙述，层次分明，情节了然，能给大家一种动荡历史的真实感。

二·家乡与家人

我是山东省临沂地区郯城县李庄镇人。郯城是山东最南的一个县，李庄镇则是郯城最北的一个乡镇，镇上居民一直就有“郯地临民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，李庄的土地属于郯城县，而居民则是临沂人，当时山东省号称有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（现在有 17 个市和 134 个县），临沂是十府之一的沂州府，郯城则是 108 县中的一个县，隶属于沂州府。沂州府几经改制，现在称为临沂市，从位置而言，是位于山东东南部，东临日照市，南界江苏省，西接枣庄市，北衔淄博市，西北与济宁和泰安市相邻，东北和潍坊市相接。地广人多，总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近一千万，其中包族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等 21 个民族，但少数民族不到 3%。

临沂的地形很复杂，60% 是低山和丘陵地带，大小山头七千余个，很多在海拔 1000 米以上，包括著名的沂蒙山区。其中沂山高达海拔 1150 米，为山东仅次于泰山的第二大山，山顶平坦处称为“崮”，最著名的“崮”就是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阵亡之处“孟良崮”。

临沂辖内，10 公里以上河流三百多条，大多由北向南流，或入江苏，或入东海。其中以沂、沭两河，携手南下，最为壮观。沂河长达 386 公里，为山东第二大河。沭河较短，为 295 公里，两河支流众多，集中在上、中游，呈树枝形水系。

从气候而言，属暖温带季风型气候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足，全年无霜期约二百天，平均气温在摄氏 12℃ 到 13℃ 之间，昼夜温差

很小。临沂区内农作物丰富，以小麦、玉米、地瓜、水稻和花生为主。举花生为例，年产近十亿斤，由于品质优良，粒大而含高量蛋白与脂肪，是为出口要项。此外，郯城银杏，苍山大蒜、平邑金银花、沂蒙茶叶、临沂全蝎，中外驰名。区内矿产亦很丰富，著名的“常林钻石”即产于斯。临沂地区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，这的文化遗产，在山东省以至全国都占重要地位，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文化，从图象文（陶文）到甲骨文字，从青铜器到竹简遗迹都在区内先后出土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72 年在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，考证为一大批古代典籍。其中的“孙膑兵法”已经散失了一千多年，据说本是“孙子兵法”的一部分。1954 年出土的画像古墓和前不久出土的环首铜刀，都是国宝古物。

自古以来，临沂地区英才辈出。春秋后期，儒家重要学派曾参，是临沂人。战国时，法家代表荀卿，为官、定居、最后谢世都在临沂。西汉有名的经学家匡衡，东汉对算盘定型有功的刘洪，以及三国时代的诸葛亮都生于临沂，诸葛家族自西汉以来便是当地望族，著名的还有诸葛瑾、诸葛诞等。诸葛亮 13 岁才随叔父诸葛玄离开临沂南下。西晋时的重臣王祥是临沂人，他更以二十四孝中的“王祥卧鱼”出名。临沂现在有一条“孝感河”，简称孝河，就是纪念他的。他的侄子王羲之，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大书法家，被誉为“书圣”，因其曾任右军将军，故又称“王右军”。他与诸葛亮一样，生于临沂，幼年迁往山阴会稽。在他故乡现设有“洗砚池”、“右军”等，以纪念他的功绩。南北朝在临沂出了经学家颜师古和书法家颜真卿，所以在“归庙书”中称颜真卿乃“琅琊临沂人也”。颜氏书法与王羲之相映媲美，现在传世的碑贴极多。

临沂辖区的郯城是一古城古县，是春秋时期的郯国故地，现在还可以看到郯国故城残垣，附近还有石碑刻着“郯城故城”四个大字。城墙虽已断断续续，但故城轮廓依然可见。据记载，故城遗址周长 4670 米，为四方形，南北略长。东墙址为 1370 米，西墙址为 1260 米，南墙址为 780 米，北墙址为 1260 米。目前北、西墙遗址尚存。东墙北段尚有列墙 250 米。现在看来墙基一般为 40 米。现存残墙最高处为 4 米，皆由黄土

堆成。墙的东西、南、北四面，各有一门。城内东北部有隆起部分，原为高埠，名“师军台”，传为郯子阅兵处。郯子为郯国君主，在城南十多里外，有郯庙村，村内有郯子庙，村北有郯子林，城西不远处，有花园村，传为当年郯子花园。

古代的郯国，为周初封国之一，在春秋时为鲁国附庸。虽是区区小国，却也颇有名气。尤其是君主郯子，他曾二次朝鲁（公元前525年）。这年秋天，到了鲁国之后，主人鲁大夫昭公设宴款待，席间，主人问他，远古帝王少皞氏为何以鸟为官名。他回答说：少皞是我的祖先，我知道答案，因为我的祖先少皞立位时，恰有凤凰飞来，这被认为是吉祥的征兆，所以就以鸟名来称呼各种官职。不但如此，郯子还举了许多其他例子，说明不同官称的来历。诸如，黄帝以云为吉祥，以云定官名，炎帝以火纪事，以火为官名。共工氏以水纪事，以水为官名。大昊以龙纪事，以龙为官名。当时满座宾主无不佩服郯子的学识渊博。不久，这件事被孔子知道了，当时孔子年27岁，在鲁国做一小官，很钦佩郯子的学识，就去找郯子并拜他为师，以求教益。“孔子师郯子”成为千秋佳话。郯国因此而扬名。

郯国从周初封国到战国初期灭亡，历时七百多年。在战国之后，由于地理位置重要，一直是鲁南的重镇。唐朝以郯国旧地置郯城县，而后屡有变更，自明初恢复郯城县以来，沿用至今。

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叙述了很多家乡的地理、历史和人文，因为我一直以为山东临沂市郯城县人而感到荣幸与骄傲。小时候，我还常常唱着一首颂扬山东的歌，其内容大致是：“山东为孔孟桑梓之邦，文化发祥之地，圣贤传，历代所宗，凡我同胞，应恪遵力行，敬祖孝父母，尊师长，信朋友和乡里……”这是一首可以历万世而不必改变的颂曲。

李庄镇北面与临沂市相邻，西面紧靠沂河，东边是丘陵，在1980年还出土了一块大钻石。南面的大镇则是县城，目前由北京去上海的公路经过李庄，交通还算是发达，可是镇民仍以务农为主。在我童年时，全镇有千多户人家，其中六七家姓孔，据说是一百多年前由曲阜孔家

大本营迁来的。大街上还有一条巷子叫“孔家巷子”。巷头和巷尾住了两户孔姓人家，我记得一家是孔昭勤大爷，另一家是孔昭俭大爷，勤俭是昔日孔家或者家家的家训。我们这一支住在镇上唯一一条大街的中心地段，家长是我的祖父孔广仁，他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，祖母（图1）生了七名子女，但长大成人的只有伯父孔昭颜、父亲孔昭曾、叔父孔昭孟和姑母孔昭媛。那个时候，由于医学常识不够，卫生设备欠缺，婴孩的夭折率一直到我那一代都是在 50% 左右。这与现在的 2.7%，有天渊之别。

8

在那个历史文化、时代背景、地理位置、社会风气、教育程度和民间俚俗的综合影响下，我童年的家庭，是一个十足或典型的宗法家庭。祖父去世之后，理当由长子当家，可是我的伯父是那个时代的公子哥儿，父亲是书生孝子，叔父又未成年，所以管家大权，操在祖母手里。到了分家之后，仍然如此。我不知道我们这一支是什么时候分家的，但听说家里的土地与房产分成了四份，就是祖母和姑姑、伯父、父亲、三叔各一份。父亲分到的是那座老宅子，有四道院子，前边的门面是抗战前开南北杂货店用的，叫做“义昌”。右邻是阳酒店，以蒸高粱酒出名叫“源茂”。左边是一条巷子，叫“九弯港”，因为有九个弯，中间并竖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“泰山石敢当”，再过去就是一所叫玄帝庙的旧址，曾改为小学。对面亦是一家酒店，叫“同丰恒”。

伯父很早就结婚了，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时候。在 20 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过是四十出头，所以才有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的说法，一般



图 1

结婚年龄都早。我的伯父娶了两位伯母，那个时代的男性，有两位太太的，比比皆是。大伯母郭氏婚后多年没有生育，所以在祖父去世后，伯父就以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为藉口，理直气壮地又娶了二伯母王氏。伯父有三个女儿，一个出自大伯母，两个出自二伯母。二伯母先生了一位女儿，名叫宪蕴，小我二岁，现在山东沂水，是位退休的小学教员，另一位在她改嫁时带走了。此后大伯母亦生了一位女儿，名叫宪芸，现在是唯一仍住在李庄的一位，她以务农为本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伯父是一个大家庭公子哥儿型长子，喜欢结交朋友，有一阵子染上吸食大烟的嗜好，在那个时代吸食大烟与娶姨太太是时髦与社会地位的象征，和现在穿着名牌衣服一样的提高身价，并不代表罪恶。他又爱耍文人气派，自己虽然受的教育不多，却很有兴趣收集古董字画一类的东西。还在每张字画上印着“孔子第七十一世孙昭彦藏”的字样。可惜所藏的字画都在屡次战乱和运动中失掉了。其中有一幅明朝窦光鼐的书法，写的是“范式字巨卿，游太学与汝阳张邵友善，并告归，式约后二年当过拜尊，共刻期日，至期，邵乃白母具鸡黍以待，而式果至”。真是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”。那时候通信和交通都不方便，可是大家都遵守诺言，两年之后，主人准备菜饭而客人依时而至，这使我联想起上海人说的“言语一句”是一个意思。

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人，在技能和心理上都没有自力更生的准备，一旦事变发生，只有坐吃山空，那一代的公子哥儿们，都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，伯父自然也不例外，他死得很不值得，生命结束在自己的手里，因为他在 1949 年后被列为地主，去世时亦不过是 47 岁（1903—1950）。我知道他是无辜的，地是上代遗留下来的，他又没有那样的心肠和能力压榨农民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伯父因为没有男孩子，所以非常喜欢我，并曾说过要把我过继给他作为儿子。当父亲和祖母等搬回日军占领的李家庄，特别捎信要我去肃庄和他住在一起，我当然很高兴去伯父家，一来伯父从来没有对我疾颜厉色过，同时伯父家吃的比较好，每天都是吃面

烙的煎饼，菜亦好，那时家里吃饭的程序很守旧，男的先吃，以后才是女的，在伯父家，每餐都是我陪他先吃。

我的父亲（图 2）排行第二，第一次婚姻，非常美



图 2



图 3

满，但是婚后不久，他的第一位太太就去世了，据说父亲非常伤心。以后再订一门亲事，门当户对，男才女貌，可是订亲不久之后，那位未婚妻又因病亡故，当时过于迷信，以后再为父亲订的亲事，就找和以前条件相反的，所以，我母亲出身贫家，未受任何教育，年大过父亲，貌相与前两位不同。换言之，我母亲所具有的条件与父亲所期望的恰好相反。听说在新婚之夜，父亲就离家出走了，这就是我母亲婚姻生活的开始（图 3），在我成长过程的记忆中，父亲是常常在打骂母亲的，话又说回来，在那个时代，打骂太太的丈夫，到处都是。母亲在孔家的地位很低，常常受气，从小我就为母亲在家中所受的待遇不服气，母亲生了四个孩子，哥叫宪佐，大我两岁，现在上海，已是两个孙子的爷爷了，另外两个比我的都夭折了。

记忆中的父亲，是家中的孝子，对祖母是无条件地遵从和教顺，对家人是兄友弟恭，对外人是与朋有交、言而有信，对孩子则是声色俱厉。父亲虽然没有受过很多教育，但却写得一手清秀的毛笔字（图 4）。他一切都遵从礼教，一切都循规蹈矩，可是他太不幸了，面对一个时代的转变，从和平到战争；面对一个家境的没落，从富有到贫困；面对一个婚姻的波折，从喜爱到逃避；面对一个现实的冷酷：从挣扎到坐牢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，快得让他没有招架之力，虽然如此，他还是对家里最负责的一个，我们虽已分家，但他总是照顾祖母和婶母，因为三叔一直在外，伯父一家又比较独立。

父亲自从抗战开始，直到 1959 年死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（1911—

图 2：父亲孔昭曾（1911—1959）（1947，山东李庄）。

图 3：母亲孔朱氏（1905—1994）（1962，上海）。

1959年)的48年——生命的一大半都是生活得很苦。听说他在1949年之后,坐过两次监狱,一次在山东,一次在上海,两次都是因为帮助他的好友刘乾三先生。刘先生被判为通敌外国,他们连ABC都弄不清楚,这真是典型的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。我1978年回到上海看母亲时,她说:“你爹知道这一辈子看不到你了。”我无限伤心。我多么想让他看到我努力的结果,为他争一口气。我自1978年后数次回国探亲,亦曾想去为父亲平反。哥哥也曾去当地公安局问过,没有什么下文。我应该去查个清楚,弄个明白,以慰父亲在天之灵。

从这里可看得出来,上一

代的人所受的教育和训练都是如何为人,而不是如何做事,所以他们都是在为人上“行有余力”而不知道如何养家糊口。这和孔家祖先留下来的教训是符合的,孔子多半是教人如何为人而很少教人如何创业。《论语》上有很多是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说法,很少有经商、置产、贱买、贵卖的指示。相反地,今天的教育则多是如何经商致富,而很少是为人处世的。很多大学都有工商学院,又有哪一间大学有道德学院?

叔父排行第三,我们都称呼他三叔。三叔是我们上一代受教育最多的一位,他长我14岁。还记得他在我们逃难中结婚(1941年)的情况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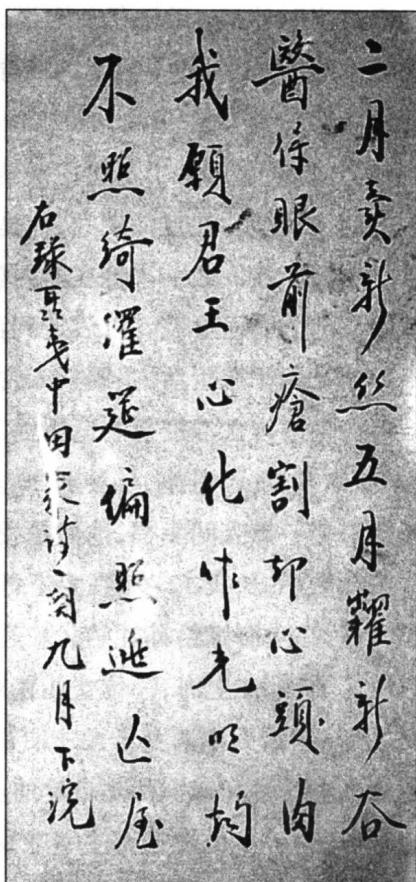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

那是我 6 岁时的事。三叔有一位儿子宪恂，现居香港。三叔是我们上一代比较幸运的一个，他不但受的教育最多，人也聪明，见识又广，思想也最开放。譬如说，他的婚姻是“自由恋爱”而成，不是“媒妁之言”的撮合。在那时候，这已是了不得的事情。他还教我不要写八股式的文章，要用白话文写信。在抗战期间，他是从我们乡下经过千辛万苦，逃到后方求学的极少数人之一。他在陕西国立 22 中毕业，又在抗战胜利之后考取上海的国防医学院，以后迁到台北水源地。大概是在读了两年之后不习惯长期军旅生活，企图转入台大医学院未果，最后在东吴大学毕业，却在台湾省德清疫苗制造所里工作了三四十年之久。其中折磨很多，不尽如意，现已退休，与分别 30 多年的婶母同住在士林山上。希望他俩能享受一点人间幸福，他们是我们上代仅存的两位了。

姑母最小，长我 12 岁，在乡下订过婚，据说未婚夫在抗日打游击阵亡了，以后在上海嫁给孙姓姑父。起初姑母不肯，曾投河自杀未遂。现有两位儿子，都在上海，一位女儿在东北。她这一生很不幸，小的时候，天资虽高，但因为本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，没有机会读书，据说她以后的读书写字和知识都是自学的。成人以后又受礼教摆弄。姑母最大的悲剧，是一生的命运都主宰在别人的手里，自己做不了主，为别人活了一辈子，更可悲的是，当时周围的人，对她的处境，不但没有人能伸一援手，连掬同情之泪的人亦不多。我记得她有一次向我抱怨道：“家人迫我太紧，你说公不公道。”那时我连发言权都没有还能说什么，现在想来，心中很酸。在上一代的人中，她对我最好。记得我第一次从上海回到山东家里希望穿西洋衣服，她为我做了一套，别人都不会做。也许是由于我们年龄相差较近，可以在言语上沟通，平等对话，不像其他的长辈，总是一副训话的口气和神情。姑母在 1978 年冬去世了（1923—1978），享年只有 55 岁，我常常在怀念她。

我 1978 年第一次重回祖国大陆时，在上海看到了分别近 30 年的大伯母郭氏。因为我拿不到回山东的通行证，大伯母和两位妹妹一同从山东来到上海，同时和在上海的母亲、婶母、姑母和她们的孩子们同

聚一堂(图5),这是多少年来孔家这一支第一次聚会,因为在“文革”期间,各家都由于害怕、猜忌而疏远。这亦是最后一次聚会。

这是30年来第一次回国探亲,回美之后百感交集,一则是高兴的看到了母亲、伯母、婶母和姑母,一则是为她们多年来所受的苦难而心酸。尤其是“文革”期间,人不成人,家不成家,国不成国,破坏之大,是国外人所想不到的。更痛心的是60年代的三年灾害,民众饥饿惨境更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据说伯母在60年代初期的灾害中,行乞度日,我听了之后心如刀割,疚愧不已。由于种种人情和政治上的原因,我们这一支分家后的四家,虽然三家都在上海,相距不远,但都是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不知道谁是谁非。对我来讲,我童年心目中的这个大家庭,已经支离破碎,不复存在了。

以上是我童年记忆中所了解的家庭和上一代家人的命运,下一代的人很多很散,他们都有机会或多或少地去主宰自己的命运,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,只是上代家人的命运都很悲惨,其实他们都忠厚善良,原本可以称得上是太平时代的良民,只是生错了时代。在他们那个时代,社会上既没有福利和救助制度,国家也没有人权意识和法治精神,他们都是在时代交替的夹缝中白白的牺牲了,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。



图5

图5:图中正面四位(右起)姑母孔昭媛,伯母孔郭氏,母亲孔朱氏和婶母孔陈氏(1978,上海)。